

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变异

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和方法

杜学增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变异

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和方法

杜学增 著



世界学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变异：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和方法/杜学增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10
ISBN 978-7-5012-4343-3

I. ①语… II. ①杜… III. ①社会语言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4155 号

- | | |
|------|---|
| 书 名 | 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变异：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和方法
Yuyan Shiyong de Shehui Wenhua Bianyi; Shehui
Yuyanxue de Shijiao he Fangfa |
| 作 者 | 杜学增 |
| 责任编辑 | 柏 英 |
| 责任出版 | 赵 玥 |
| 出版发行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 地址邮编 |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
| 投稿信箱 | guojiwenti@yahoo.com.cn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景山教育印刷厂 |
| 开本印张 | 980×680 毫米 1/16 15¾ 印张 |
| 字 数 | 258 千 |
| 版次印次 | 2012 年 10 月第一版 201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012-4343-3 |
| 定 价 | 36.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杜学增是我的校友，也是学术上的同人。杜教授在跨文化交际和语言使用变异的研究领域成果斐然，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他几十年来从事英语教学，多年来致力于社会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研究，钻研不辍。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老校友的文章和专著，每次读后都觉得受益匪浅。他的这部新著我先睹为快，我原本就对语言使用变异很感兴趣，杜教授的精彩论述更点燃了我的研究激情。

杜教授的新著不仅对中国社会语言学领域，而且对语用和跨文化交际和其他相关领域都是很大的贡献，因为他所讨论的是当前包括互动社会语言学在内的社会语言学界、语用学界、跨文化交际学界以及外语教育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尤为可喜的是，杜教授对中国文化特有的语言使用的变异现象有深刻体会，观察细致入微，所举实例真实生动，对读者颇有启迪作用。此项研究对提高我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以及语言理论的建构、第二语言的学习、翻译理论和实践、跨文化交际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

我们曾天真地认为，只要把交际中的语言使用时的情景和相关因素加以明确和具体化，语言使用的规则就会一目了然，教授语言使用能力这一复杂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当今，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个体之间的日益频繁交往已成为全球社会现实，在这种全球化的社会现实中，“谈话”已经被学者广泛认为是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观点产生的结果是：一方面，因为语言使用变异发生之频繁，使人们在日常交往中越来越感到困惑，“每当代表交际者社会身份的交际范例和语言标记出现变化的时候，社会现实本身就会受到质疑”；“另一方面，日常说话和社会现实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并为其服务”（Gumperz J & Cook-Gumperz, 1982）。因此，我们不能

简单地得出社会现实塑造语言的结论，因为语言也在塑造社会现实。

本书作者试图告诉我们，社会和文化现实以及习以为常的交际规范如何进入人们面对面或其他形式的交际实践，从而创建一个充满变化的互动空间（interaction space）。在这一空间中，交际者根据约定俗成对行为做出自动化的反应或无意识的解释（interpretation），推断或猜测的社会语言过程会生成多种结果，从而使相关的解释受到怀疑。作者从理论和语言社会实践两个方面探讨这一现象，讨论意义是如何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并诠释这一意义实现过程与社会现实（包括价值观等）的互动产生的影响。

作者在前三章从社会和文化与语言使用的关系入手，进行多方位、多角度和多学科的阐述，为语言使用变异研究做了铺垫。在第四章，作者进入核心问题，以翔实的交往事例为依据，对言语行为的社会文化变异及与其相关理论进行详尽的讨论和分析。之后，对会话合作、礼貌原则以及面子工夫等社会规范和理论框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有关研究的基本理论一一呈现。

如果把作者对语言使用的社会和文化变异现象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归纳起来，我们倾向于得出以下的结论：

“社会语言学是社会现实的语言学”（E. A. Nida, 1964）。在社会现实中，每一个人都属于不同的社团，具有不同的社会身份，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社会交往中，这些社会差异导致了言语行为、言谈风格、语体、语篇结构等方面的社会文化变异。实际上，语言之社会变异及其规律的研究，是一种新的语言观，在这一视角下，“语言存在于大量的变异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这些变异之总和”（Wardhaugh R., 1986）。

语言使用变异或言谈是否得体或适应，受制于其发生的社会情景因素，包括：J. Fishman（1968）、A. M. Zwicky（1985）和 N. Wolfson（1989）提出的“谁说什么，对谁说，何时何地、怎么说，为什么说”，D. Hymes 提出的“谈话”（Speaking）所涵盖的社会因素，Labov（1972）提出的社会环境因素，Gumperz（1982）从互动社会语言学理论的角度提出的环境化和文化传统所包含的因素，等等。

语言使用发生的情景或其他环境受制于文化，不同文化对情景和特定情景中的语言使用是否得体有不同的假设（assumptions）和预期（Gumperz J. & Cook-Gumperz, 1982; Jia Y. X. & Jia X. L., 2008）。

不同的语言在使用中所完成的社会功能或担负的社会任务具有普遍性,但是,言语行为在实施这些功能和任务的过程中采用的方略(strategies)因文化和情景而异。不同文化在不同情景中各有独特的言语风格、语体和语篇(话语)结构以及相关的规则和解释规范,这些规则或规范被有些学者称为语用语言规范(pragmalinguistic conventions)。这些规范尤其与言语行为实施方略直接相关(H. Spencer-Oatey, 2000; Jia Y. X. & Jia X. L., 2008)。

不同文化各有制约语言使用 and 调适与管理人际关系的社会语用规范(sociopragmatic conventions)。比如,谈话就受所在文化的社会规范制约,而这些规范与价值观和世界观密切相关。Leech 针对 Grice 的“合作原则”从修辞学和语体学的角度提出的所谓“具有普遍意义的礼貌原则”,Brown & Levinson 关于交往中的面子功夫,乃至中国文化中特有的谦虚、客气和含蓄等,都属于社会语用规范范畴。

以上提及的语言使用所涉及的规范和实施方略等,也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而且因人而异。

以上几点想法恐怕难以准确地概括本书的观点,更难以全部展现本书的特点。当读者亲自阅读时,就能亲身体验其价值和作者用心之良苦。

本书对社会语言学做了概述,对语言使用变异研究的方法、语料收集、研究项目设计以及变异的不同处理方法等方面的阐述言简意赅,有助于读者深入和全面地了解此类实证研究的方方面面。

语言的社会文化变异现象极为复杂,涉及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且动态多变,变幻莫测。在当前本土全球化和全球性本土化的互动过程中,文化、言语社团、个体的文化和社会身份正在超越原有的边界,与他者相互融合、相互杂糅、寻求共识与认同,这是全球化社会的发展趋势,它意味着全球化为语言的社会和文化变异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当然,这也意味着,有关研究不仅更加重要,而且十分艰巨。杜学增教授在这一领域奉献出了精彩的研究成果,开了个很好的头,但我们的路还很长,任重而道远。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会长
贾玉新

2011 年夏秋之交于哈尔滨工业大学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社会语言学概说	(4)
第一节 什么是社会语言学	(4)
第二节 社会语言学溯源	(6)
第三节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	(11)
第四节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16)
第五节 社会语言学的特点	(19)
第二章 语言与文化	(22)
第一节 文化的涵义	(22)
第二节 语言也是文化	(24)
第三节 文化与概念范畴	(25)
第四节 语言与价值观	(27)
第五节 语言相关性	(28)
第六节 第二种语言相关性	(33)
第三章 语言变异	(40)
第一节 语言变异界说	(40)
第二节 语言变异的社会文化因素	(41)
第三节 语言变异的类别	(41)
第四章 说话规则变异	(50)
第一节 说话规则界说	(50)

第二节	说话规则变异	(51)
第三节	说话规则变异的类别举例	(52)
第五章	语言使用社会文化变异研究的基本理论	(98)
第一节	言语是一种模式行为	(98)
第二节	言语模式的具体表现	(99)
第六章	语言使用社会文化变异研究的理论框架	(107)
第一节	言语社团	(108)
第二节	语体(言语)风格	(111)
第三节	言语情境	(112)
第四节	言语事件	(113)
第五节	说话规则	(122)
第六节	言语行为	(126)
第七章	其他相关理论	(130)
第一节	会话分析	(130)
第二节	礼貌理论和面子功夫	(140)
第三节	互动社会语言学	(145)
第八章	语言使用社会文化变异的研究方法	(153)
第一节	实证研究	(153)
第二节	定性研究	(154)
第三节	定量研究	(154)
第四节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结合运用	(155)
第五节	研究的信度	(156)
第六节	研究的效度	(159)
第七节	信度与效度的关系	(162)
第九章	研究项目的设计	(163)
第一节	课题的选择	(163)
第二节	样本的选择和确定	(168)
第三节	研究步骤	(172)

第十章 语言素材的收集	(179)
第一节 语言素材的标准	(179)
第二节 语言素材的来源	(180)
第三节 语言素材的收集方法	(181)
第四节 角色扮演	(190)
第五节 问卷调查	(190)
第六节 书面和口头形式的角色扮演问卷	(192)
第十一章 语言使用社会文化变异研究中的不同处理方法	(195)
第一节 言语行为的量化单位	(195)
第二节 三段式言语行为的量化单位	(197)
第三节 言语行为研究的案例分析	(198)
结 语	(225)
参考文献	(227)
后 记	(238)

引言

本书所要讨论的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变异及其研究，主要以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和方法来观察和研究语言使用的变异现象，也涉及语言学中其他相关领域，如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分析、礼貌理论、面子功夫等，但侧重于社会语言学的实证研究。这类研究对认识语言本质、建构语言理论、习得第二语言、翻译理论和实践、跨文化交际都有关联意义和参考价值。

众所周知，在当代语言学的研究中有诸多方向，其中两大方向尤其引人注目。

首先是以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 Chomsky）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学派。该学派主要研究语言的普遍性特点，主要关注语言能力的研究，即一个理想的说话人或听话人能够说出或理解句子的能力，包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句子和句子是否合乎语法的知识，对于语言运用或语言使用则不屑一顾。该学派主张研究和确立一种普遍适用的语法系统（universal grammar），用以加深人们对语言的理解、对语言习得的理解、对人脑的理解。乔姆斯基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语言学概念——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performance）。

其次是许多社会语言学家所坚持的方向。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如海姆斯（Dell Hymes）和拉波夫（William Labov），甚至包括一些理论语言学家，如哈德森（R. A. Hudson），不同意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如果脱离社会和文化，忽略研究语言的运用或使用是不完整的或者不恰当的。他们认为，完整的、正确的语言学理论建构一定要考虑到语言使用和语言使用的变异现象。

语言使用及其社会文化变异的研究不仅在建构语言理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语言的实际运用方面也有不可或缺的价值。这主要表现

在交际和跨文化交际、第二语言习得或外语习得、翻译实践诸方面。文化影响所造成的语言使用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在同一个社会和文化中，人们操同一种语言，但由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语言使用方面的差异随处可见；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这种差异就更明显了。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变异直接影响到交际过程。言语不得体，说话不符合特定社会的交际规则或交际规范，就会造成交际受阻或失灵、产生误解、伤害感情等不利于交际和人际关系的诸多后果。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变异也与外语习得密切相关。语言教师和语言学习者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解决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变异问题，才能成功地教授或习得某一种特定的语言。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特殊形式，话语或文本中的文化差异也不胜枚举，不论是口译还是笔译，译者都无法回避文化的问题。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变异的意识和知识，有助于翻译得更准确、得体、有效。

笔者多年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针对语言学专业研究生开展社会语言学的教学工作，侧重于语言使用的社会和文化变异方面的研究，深知这一领域的复杂性和艰辛程度。从现实生活中收集语言素材，基于正确的语言理论深入分析所获得的语料，从中发现语言使用的模式特点，引出恰如其分的结论，是一个饶有趣味但又十分辛苦的研究过程。社会语言学的实证研究，尽管十分重要且对研究人员有很大的吸引力，但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也常会使人望而却步。但是为了促进这一学科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应该知难而上，努力做出新的成绩。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撰写了本书，通过它和本领域的研究者或者其他感兴趣的人们一起探讨有关这一领域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

除引言和结语之外，本书共分十一章。在引言部分，笔者简略地说明了本书的研究方向、目标、意义和写作对象。第一章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对社会语言学进行概说，本书的论题是以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和方法来讨论语言使用的社会和文化变异，因此对社会语言学进行简略的讨论是必要的。第二章讨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本章的重要性在于它对本书的主题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因为文化影响语言及其使用基本是学术界的一项共识。第三章讨论语言变异。人类语言是一种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交际系统。世界上供人们使用的语言有数千种，它们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其个性主要体现在各种语言体系的差异上。语言在语言内和语言外所显示的差异就是语言变异。研究语言变异如同研究语言的共性一

样重要,因为它帮助人们认识语言的多样性,从另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第四章主要讨论说话规则的变异。语言变异表现在诸多层面上,如语音、语调、语汇、语法、语体、语篇、语言使用等。语言使用的变异及其研究是社会语言学领域的一个分支,既有理论探讨的意义也有实际运用的价值,因此是本书讨论的重点之一。第五章综述语言使用的社会和文化变异研究的基本理论。研究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变异有不同的研究理论和观察视角,而本书主要是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视角来讨论这一题目。第六章主要讨论语言使用社会文化变异研究的理论框架,这就是言语文化学(ethnography of speaking)所提供的研究模式。第七章讨论语言使用社会文化变异研究中所涉及的相关理论,如会话分析、礼貌理论、面子功夫、互动社会语言学等。第八章关注的是语言使用的社会和文化变异的研究方法,涉及实证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以及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九章的讨论重点是研究课题的设计。在实际研究中要重视具体的研究方案的设计,其中包括选题、样本、实施研究的具体步骤等。第十章探讨语言素材的收集,包括收集语料的步骤、方法、需要注意的事项等。第十一章讨论语言使用的社会和文化变异研究中不同的处置方法,通过实际案例的分析,引导和帮助研究人员(主要是入门者)学会如何具体实施一项语言使用变异研究。相关的研究案例是前人的研究成果,是他们运用相关理论、采用某种适宜的方法、实施一项课题的具体展示,有很好的启示意义,有助于对实证研究的认识和把握。总结部分引出相关的结论。

期望本书对从事二语习得的研究人员和教师、翻译、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人员有参考价值,尤其希望小作能鼓励和帮助大学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加深对社会语言学的认识,掌握语言使用社会文化变异方面的知识和研究方法,积极深入地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既是一本专著,也是一本关于如何实施语言使用社会文化变异研究的教材。

第一章 社会语言学概说

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变异及其研究，属于社会语言学的范畴，因此，有必要对社会语言学本身做一个概述，把基本问题交代清楚，以使后面的论述自然、有序、明了。

第一节 什么是社会语言学？

要回答“什么是社会语言学”或者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难以用一两句话说清楚的。由于社会语言学本身的特点，要对它进行简明扼要的界说是困难的。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尽管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论著纷繁，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兴未艾，但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准确的、被语言学界广泛认可的定义。这本身就说明了社会语言学的复杂性。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暂且不妨说，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关系的学问。但是，这个说法太空泛，需要解释。

语言和社会之间有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首先是语言对社会的影响，具体指语言的社会功能。其次是对语言的影响，具体指语言的变异、变体和语言使用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变异。而后一种关系，即社会对语言的影响，才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点。

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具体说，语言是信息的载体、社会交际的工具；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语言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工具；语言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纽带；语言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重要标志。很难想像，如果没有语言，人类社会将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都明白，在日常的交往中，话说对了，一切都会顺利地进行；话说错了，或不甚清楚或不恰当，不仅会造成误解，还会贻误大事，甚至结下怨恨。这种例子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胜枚举。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汉语是汉民族的语言。就汉语本身来讲，又有方言土语之分。一般说，北京人听不懂广东话，青海人也听不懂吴方言。所以，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为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政府推广普通话。推广普通话其实是在实施语言规范化的工程。

语言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共同语。除了思维和交际之外，语言还是民族或国家的象征。语言把每个说民族共同语的本族人团结起来，凝聚起来，使他们有一种归属感、认同感、自豪感，并千方百计地维护语言的尊严和神圣性。语言的象征性不仅表现在民族共同语上，也表现在方言上。有些人宁愿说方言而不讲普通话，原因之一是他们想突出自己的地方身份认同。

由于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社会也必然对语言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们的阶级出身、社会地位各异，从事不同的职业，再加上年龄、性别、民族等方面的差别，人们使用的语言形式就会千变万化，这就形成了语言的变异和变体，并表现为语音语调的差别、语法语汇的差别、语言使用习惯的差别。一般说来，英语国家的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语言表达的许多方面是不一致的。就是在同一个阶级或阶层中，男女老少的讲话也有很大的差别。在北京话中，“德性”、“一号”等词带有明显的女性特征，即用这类词的女士较多。“镇了”、“盖帽”之类则是北京中学生的口头禅。现代北京青年人还常用一个词来描述办事利落，这就是“爽”。

这样看来，社会变量对语言的影响，使语言产生了变异、变体和语言使用习惯的差异。所以，有的语言学家，如布莱特（William Bright，1964）在界定“什么是社会语言学”时是这样概括的：社会语言学的任务在于描述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covariance of language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我认为这个界说比较简洁，也抓住了关键，认为语言变异受社会变量的影响。但是“共变”的概念使人弄不清侧重点，人们要问：语言和社会并重呢还是有所侧重？我认为，社会语言学侧重前者，而从后者寻找原因。

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费什曼 (Fishman J. A., 1972) 在《在研究谁对谁何时说何种语言时所展现的宏观社会语言学与微观社会语言学之间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cro-and Macro-Sociolinguistics in the Study of Who Speaks What Language to Whom and When) 一文中最早用简洁的语言对社会语言学进行了界定, 即“谁对谁在什么时候使用了什么样的语言”(who speaks what language to whom and when)。

另外, 美国语言学家佐伊基 (A. M. Zwicky, 1985) 也用同样的方式来概述这个学科领域的核心任务, 即“谁对谁在什么场合说了什么样的话”(Who says what to whom and on which occasion)。

类似的表述形式也在其他人的著述中出现过,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沃尔夫森 (Nessa Wolfson, 1989) 就说过: “谁对谁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用何种方式、说了什么话”(Who says what to whom, when and how)。从这句话中, 我们发现了语言与社会变量这些构成社会语言学的最基本因素。“What”指说的什么话, “how”代表说话的方式, “who”、“whom”、“when”代表社会变量, 即说话人、听话人、在什么时候或什么场合说的什么话, 采用了何种语言形式。

综上所述, 不管人们如何界说社会语言学, 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 它主要研究语言的变异、变体和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变异及其社会文化成因。

第二节 社会语言学溯源

语言和社会的相互影响随着语言的产生就开始了, 语言的变异、变体以及语言使用习惯的差异也早就存在了。语言学家早就注意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语言, 并一直关注和研究它的发展和变化。

早在 19 世纪, 德国语言学家和外交家洪堡特 (Wilhelm von Humboldt) 就注意到了语言描述客观现实, 对其进行归类的各种不同的方式。他还认为, 语言的多样性并不仅仅表现在语音和语言形式方面, 而且表现在人们认识世界的多样性上。

20 世纪初期,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 (Edward Sapir) 和沃尔夫

(Benjamin Lee Whorf) 提出了引人关注的著名假说, 这就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他们实际上最明确无误地提出了语言相关性的理论, 认为语言使用习惯决定了人的看法, 也就是人的世界观。尽管许多人对此有异议, 他们的假说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并促使人们继续研究语言与文化及思维的关系。

在这一时期, 著名的英国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对语言与社会或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有了重要的观察和论述。他曾在太平洋的南海区域做过实地调查, 并于1923年发表了题为《原始语言的语义问题》(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的论文。他注意到, 对南海岛民的了解离不开对其文化的认识; 真正的语言事实就是岛民们在实际场合所说的全部话语。他认为, 如果不把岛民说的话随时和他们的文化联系起来, 那就无法理解, 因为语言植根于文化的现实之中, 植根于部族的生活之中, 植根于他们的习俗之中。不考虑话语的具体大场合, 就无法理解话语本身。

稍后, 深受马林诺夫斯基影响的英国语言学家弗思(J. R. Firth), 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做出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 对语言的研究必须在其使用的实际场合中进行, 涉及语言的所有层面, 并侧重于语义的研究。语言学家必须研究文本(text), 即话语语料。也就是说, 研究文本时还要研究其语言环境或场合以及这些场合中和话语有关的诸如人、物体和事件等非语言成分。弗斯于1937年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人类语言》(The Language of Mankind), 并在该书中首次提出了“社会学语言学”(sociological linguistics) 的概念, 类似于今天的“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 它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后面还要专题讨论。

1949年, 美国语言学家马里奥·裴(Mario Pei) 发表了题为《语言的故事》(The Story of Language) 的专著, 重点讨论了宗教、家庭、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封建迷信、文学、科学、教育、心理、地理等社会文化因素对语言的影响。他虽然在书中讲的都是有关社会语言学的内容, 但没有提出社会语言学这个命题, 当然也没有从理论的高度加以阐述。

20世纪50年代初期, 颇有影响的美国语言学家威因里希(U. Weinreich) 发表了他的名著《语言接触》(Languages in Contact)。他

在书中指出，语言问题既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去观察，也可以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观察，这三种观察视角是可以相互支持的。

1960年，美国语言学家派克（K. L. Pike）发表了他的《语言与人类行为结构一体论的关系》（*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r*）一书，其中也涉及了社会语言学的内容。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这个术语最早出现于1939年，首先由霍德森（T. C. Hodson）在印度使用（Le Page, 1997）。在那个时代，他注意到语言学研究缺少有关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因而单独提出了这一术语。后来，美国诗人和哲学家丘里（Haver Currie）在1952年也曾使用过这一术语。社会语言学兴盛起来并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是60年代中期的事情，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两位语言学家拉波夫（W. Labov）和海姆斯（D. Hymes）。当然，其他一些语言学家，如费什曼、弗格森（C. A. Ferguson）、甘柏兹（J. J. Gumperz）等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社会语言学在这一时期的兴盛并引起强烈的研究兴趣是有原因的。一般说来，尤其是在美国，语言学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重点发生了转移。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北美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由乔姆斯基建立的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TG）始于50年代，延续到60年代。毫无疑问，这一学派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即便是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一些语言学家也质疑它的局限性，认为它的理论不能解释活生生的语言现象，更不能从社会交际的角度来说明语言使用的特性和共性。

说得再具体明确一点：人们发现有三个因素促使了社会语言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兴盛和发展（Shuy, R. W. and Fasold, R. W., 1972）。

第一个因素是，在美国语言学界普遍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能为语言学的理论找到更为坚实的实证基础，要有实地调查研究的数据作为依据。笔者认为，这一观点的针对性是明确的，直指结构主义和转换生成语法，因为后者所关注的是对语言能力（competence）的研究，即一个理想的说话人和听话人能够说出和理解句子的能力，包括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句子和句子是否合乎语法的知识。对于语言使用，他们则不屑一顾。该派主张确立一种普遍使用的语法（universal grammar）。